

# 护法时期的李烈钧与唐继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徐辉琪

护法运动又称护法战争，是孙中山继讨袁护国战争后为维护《临时约法》发动和领导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护法运动是在各种关系矛盾中展开的。其中，孙中山革命派同西南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无疑居主要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关系到护法运动的发展和命运。因此，从李烈钧与唐继尧关系变化的角度加以考察，这不仅有助于对李、唐的全面评价，对深入研究护法运动的历史也是十分必要的。

—

研究历史，重在研究历史过程。只有了然过程变化，才能揭示其全貌。因此，有必要首先对李烈钧与唐继尧护法前的关系加以考察。

李烈钧与唐继尧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结识。在留学热潮冲击下，他们同于1904年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陆军，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留日期间，他们又都加入同盟会，在政治上同聚于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下。

当时，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是该校中国留学生历届人数最多的一期，毕业时有197名。李烈钧与唐继尧同为炮兵科。从毕业成绩看，唐继尧总分为116.4分，在炮兵科中列20名，李烈钧总分107.4分，列31名，唐继尧优于李烈钧<sup>①</sup>。当然，在那时，对于怀抱救国志愿的热血青年来说，学习成绩似乎并不能说明一切。因为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参加革命活动的多少等等。

---

<sup>①</sup>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明治41年11月第六期清国学生毕业试验考科列叙表》，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档：《在本邦支那留学生关系杂件——陆军学生之部》第3卷。

据同为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的阎锡山回忆：在士官学校期间，他经常与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绶光等在一起“分析时事，研究政情，并曾编著《革命军操典》与《革命军战法》”，“均为适应回国革命而作”<sup>①</sup>。此外，李烈钧与唐继尧当时还参加组织“武学社”等革命小团体。可见，在留日期间李烈钧和唐继尧对参加留日学界的革命活动是热心的，彼此的联系也是比较多的。

1908年底，李烈钧、唐继尧毕业后相继回到国内。李烈钧最初任江西新军管带，利用公开身份在士兵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但不久遭到上司的陷害，被迫离开江西，于1909年春到云南昆明，经李根源推荐任讲武堂教官，并兼任督练公署兵备处提调。这时，先于李烈钧回到云南的唐继尧任新军管带、讲武堂监督等职，于是李烈钧与唐继尧的关系又紧密了一步。不过，由于李烈钧在随后反对英国出兵进占中国片马地区的斗争中表现激烈，不为云南当局所容，1911年夏被指派为参观永平秋操代表，实际被排挤出云南，没有同唐继尧等一起参加筹划与发动云南的辛亥起义。

李烈钧与唐继尧虽为同学、同志，但武昌起义后的表现却迥然不同。李烈钧于接任江西都督后，坚决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演出了一幕幕针锋相对的斗争，可谓民初政坛反对妥协、捍卫共和的一面旗帜。唐继尧则公开拥袁，完全背弃了一个革命党人的立场。这样，李烈钧与唐继尧在政争中就实际处于对立地位。1913年2月5日，时任贵州都督的唐继尧与云南都督蔡锷、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陆荣廷联名通电，内称：“近闻有奸宄之徒，阴谋窃据，乘机思逞，大江以南恣情鼓煽，事虽无据，语出有因，缔造方新，岂敢再有破坏？”他们并表示：“吾辈职责所在，惟有尽力所能，声罪致讨，必不令奸谋得逞，致陷危亡。”<sup>②</sup>当时正是李烈钧围绕订购军械被扣同袁世凯剑拔弩张斗争激烈之时，所以尽管蔡锷事后否认该电专对江西而发，但京、沪各地报纸均认为“系指赣事者”。李烈钧先是发“谏电”加以批驳；后针对蔡锷的“解释”，复电蔡与胡景伊、唐继尧，称“诚恐外间不识赣局之真相，误会诸公之本意，用以谏电略述梗概”。接着说：“松波（坡）、文澜、冥庵三兄，暨在滇、蜀、黔诸学兄，烈钧相知最久，或领指教之方，或受搓磨之益，要均属肝胆之交，尚焉有睽隔之理

<sup>①</sup>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转引自蒋顺兴、李良玉主编《山西王阎锡山》，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0页。

<sup>②</sup> 《蔡锷等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等电（1913年2月5日）》，见拙编《李烈钧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第152页。

耶？惟念贻事发生，既不能释军部之疑，复重烦诸兄远虑，松兄号电，尤令人增五夜之惭，深同袍之感耳。”<sup>①</sup> 蔡锷、胡景伊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早李烈钧、唐继尧三期。李烈钧这里称兄道弟，又特别提及同学情谊，无非是表示在其最困难的时候即使得不到同学的支持也不该受到无端的攻击，于无可奈何中浸透着几许苦酸的心情。

但历史是复杂的，有时还真有点作弄人的味道。当袁世凯图谋恢复帝制暴露后，在讨袁护国的旗帜下李烈钧与唐继尧又走到了一起。“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大多逃亡日本，由于在对形势的判断、革命党人采取何种对策、特别是在重建中华革命党问题上李烈钧不完全赞同孙中山的意见，发生严重分歧，以致愈演愈烈，双方发展到行动上公开分离。因此，当袁世凯阴谋称帝，李烈钧所以选择冒险“闯关”到云南发动讨袁，固然有其曾在云南从事革命活动的基础和同唐继尧有同学关系的原因，但同时又具有浓重的党派争斗色彩。可以说，李烈钧到云南同蔡锷、唐继尧等策划武装反袁，同孙中山领导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根本上属于两个不同体系，或者说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李烈钧完全脱离孙中山，而同唐继尧为首的云南地方势力结为一体。实际上，护国战争开始后李烈钧担任护国第二军总司令，其军队组成与供需均依赖于云南，已同唐继尧形成不可分离的关系。李烈钧公开宣称：“钧受都督唐公命充中华民国护国第二军总司令。”<sup>②</sup> 清楚表明了他们的这种关系。

护国战争打响后，随着蔡锷、李烈钧相继率军入川和进军两广，讨袁形势迅猛发展，很快波及全国。其中，有两点尤为值得注意。一是护国军军政府——军务院在广东成立，唐继尧被推为抚军长，李烈钧被推为抚军之一。这不仅表明李烈钧在西南各省联合讨袁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而且由于担当护国第二军统帅的特殊身份，实际充当了唐继尧同军务院及两广地方势力的联络人。同时，李烈钧亦因此与桂系发生较多联系并受其影响。例如，对于岑春煊，当最初酝酿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李发表谈话称：今拟推岑春煊“为两广都司令，名称似甚不妥，在愚意不如直以大元帅推之为宜。据法国制，于大总统亦无碍。”又说：“拟举唐都督为讨袁军军长，是亦一时权宜之计。南省大局奠定，再行推举大元帅，亦未为迟也。”<sup>③</sup> 可见岑当

① 《复蔡锷、胡景伊、唐继尧电（1913年2月25日）》，《李烈钧文集》，第158～159页。

② 《致唐继尧函（1916年2月3日）》，《李烈钧文集》，第239～240页。

③ 《与南宁某报记者的谈话（1916年5月6日）》，《李烈钧文集》，第258页。

时在其心目中占有何等的地位，这在以后亦时有显露。另一点是，随着讨袁形势的发展，孙中山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斗争策略。云南宣布起义初，孙中山曾提出中华革命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sup>①</sup>，寄希望在全国造成中心地位。但孙很快发现不可能成为主角，宣布取消“中华革命军”旗号，在行动上与护国军“共力进行”，“取一致之行动”<sup>②</sup>。这实际表明，护国讨袁的兴起和发展逐渐弥合了革命党人原来存在的分歧。李烈钧与孙中山间的隔阂也随之渐渐消除。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唐继尧在护国讨袁中又有保存实力乘机扩张的一面。突出表现在对蔡锷、李烈钧率领的护国第一、二军在兵员配备、供需等方面极加刁难，以达其控制的目的。蔡锷和李烈钧都曾表示强烈不满。李烈钧甚至致电唐继尧发泄说：“为制胜全局计，冲出中部最为要图，但二军兵单将寡，毓兄所部如何动作，未奉公命。若止用敝部出湘，则兵力大形单薄，欲以攻取自由，万难从事。前蒙允加劲旅，究竟所加若干，何时起程，乞赐明命。若无兵可加，则拟从此而止，另派相当将领，代统所部，使按兵边邑，相几因应。弟则拟单身出海口，间行至沪，从旁赞助，并可稍养病躯。”<sup>③</sup>同时，对于讨袁，李烈钧更为激进、坚决。例如，对唐继尧同意四川方面“停战”，李烈钧致电从五个方面力陈其不可，最后归结说：“国运所关，在此一举。停战之约，影响于战局者其害小，影响于人心者其害大。”<sup>④</sup>一再表示：“今日非整我军旅，储我军粮，为直捣黄龙之计，不为功也。”<sup>⑤</sup>强调：“吾等之倒袁，初无何等之权利思想。”“吾人革命，志在强国。若要强国，必先倒袁。”以至用激愤的语言说：“如不倒袁，不要活的，宁要死的。有如此决心，终必有达到目的之一日。”<sup>⑥</sup>这些都表现了李烈钧与唐继尧的差异。

护国讨袁战争结束后，李烈钧率领的护国第二军留在了广东，当时编制为两个师，分别以张开儒、方声涛为师长，一般被称为驻粤滇军。虽然李烈钧不久就离开军队，但仍与张、方保持密切联系，保持着护国第二军

① 《致上海革命党人电（1915年12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220页。

② 《致岑春煊电（1916年5月上旬）》、《致岑春煊等电（1916年5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6~287页。

③ 《致唐继尧电（1916年4月5日）》，《李烈钧文集》，第251~252页。

④ 《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4月7日）》，《李烈钧文集》，第253~254页。

⑤ 《与南宁某记者的谈话（1916年5月6日）》，《李烈钧文集》，第258页。

⑥ 《在南宁欢迎会上的演说（1916年5月7日）》，《李烈钧文集》，第259~260页。

总司令名义。

从以上简单考察中，可以看到李烈钧与唐继尧关系源远流长，到护法运动前总体表现为从属亦即节制与被节制的关系。但同时又包含多种可变和诱发的因素。这样，随着历史进入护法时期，在新的条件下其关系必将呈现更为错综交织变化的局面。

## 二

实际上，就护法而言，李烈钧与唐继尧进入角色的情形并不相同。李烈钧是经历了一次小小挫折后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行列中；唐继尧则完全处于被争取的地位。

还在1917年6月初，当府院之争愈演愈烈，报载“有某某处宣布独立之说”，时在上海的李烈钧就发表通电提出“护法卫民”的口号<sup>①</sup>。随后，应广东督军陈炳焜、广东省长朱庆澜电邀，抱病到广州，投身实际斗争，宣称：讨逆“为光明磊落之人”，“办光明磊落之事”，号召各界“同心协力，一直向前。务要达铲除逆贼拥护共和之目的”。他并表示：“鄙人身虽病弱，亦甚愿听两公之命出师讨贼。”<sup>②</sup>7月1日，张勋复辟粉墨登场，3日李烈钧以“中华民国护国第二军总司令”名义与张开儒、方声涛联名通电，痛斥张勋背叛民国行径，宣言将率护国第二军“申讨叛贼，为天下先”<sup>③</sup>。

其实，如上所说，李烈钧在民国初年就以不畏强暴、敢于同袁世凯针锋相对而著称。所以，讨袁护国战争中他把护国讨袁直视为“护法”，宣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而无法，是谓不国。袁氏坏法，吾始讨制之，故吾护国宁言护法。”又说：“我军务院成立，屡以拥护约法、保障国会，昭示天下，实为神人之所共鉴，经义之所不移。烈钧一介武夫，服从为职，故只知有法，罔识其他；有蔑法者，视与贼等。”<sup>④</sup>可见，李烈钧对于践踏、背弃《临时约法》的行径所以义愤填膺，声罪讨伐，敢“为天下先”并非偶然，应该说也是真诚的。

<sup>①</sup> 《致黎元洪等电（1917年6月1日）》，《李烈钧文集》，第319页。

<sup>②</sup> 《在朱庆澜欢迎会上的演说（1917年6月9日）》，《李烈钧文集》，第320~321页。

<sup>③</sup> 《与张开儒、方声涛致黎元洪等电（1917年7月3日）》，《李烈钧文集》，第324~325页。

<sup>④</sup> 《与张开儒、方声涛致国会议员电（1916年6月3日）》，《李烈钧文集》，第271~272页。

但盘踞两广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不过是借“讨逆”之名以维护其实力地位，把“护法”作为权势交易的筹码。朱庆澜虽然不完全同于桂系，但力量有限。因此，尽管李烈钧怀抱满腔热忱，其讨伐计划却始终未能付诸实现，最后不得不离开广东。离粤前，李烈钧发表“谈话”，对陆荣廷迟迟不同意出兵提出指责，抨击说：“余个人此次对于国事，始由热而愤而悲而哭。今悲哭不已，将破涕为笑，准备作个亡国民罢了。”<sup>①</sup> 悲恨之情，溢于言表。

正由于有此一幕，当孙中山7月南下发动护法，李烈钧便毫不迟疑投身其间。在欢迎海军大会上，他开宗明义说：“兄弟前次来粤，系于联合军民，一致拥护共和，并与西南各省一致进行，以征讨逆贼。今再抵粤，亦即欲我陆军同胞联同海军，合力并行。吾人坚持宗旨，凡有祸国违法之贼，皆在讨伐之列，不能丝毫苟且调停。”<sup>②</sup> 他的护法态度鲜明而坚决。

而此时，唐继尧则正热衷于对四川的武力扩张。为达到争夺四川的目的，唐于是年8月11日宣布“护法”，但同时又打出“靖国”的旗号，明显含有别树一帜的意图。尽管如此，由于势力单薄，孙中山当时为了护法不得不借助于拥有地盘的地方势力，与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陆荣廷的桂系采取“联合”方针，极力争取得到唐、陆的支持，特别是唐继尧的支持。孙中山明确表示：争取唐、陆，唐是关键；只要唐宣布就元帅职，陆“自不便独异”<sup>③</sup>；还说唐就职“所关尤重”<sup>④</sup>，“大局转机，实在于此”<sup>⑤</sup>。他并一再致电或派人请唐继尧就元帅职。

如果单从一般事理推断，李烈钧与唐继尧参加护法的背景既然不同，其表现亦必相殊。或者说，李烈钧当会有别于唐继尧，全力以赴支持孙中山。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当护法战幕拉开，李烈钧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政府参谋总长，同时他又被唐继尧委派为全权代表。对于孙中山的任命，李烈钧始终没有宣布就任，而对于唐的委派则欣然接受。随后，他又接受刘显世、熊克武“委托”，担任贵州、四川全权代表。事实上，在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整

① 《与〈珠江日报〉记者的谈话（1917年7月15日）》，《李烈钧文集》，第327~328页。

② 《在欢迎海军大会上的讲话（1917年8月6日）》，《李烈钧文集》，第328页。

③ 《致唐继尧电（1917年10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212页。

④ 《致章炳麟电（1917年1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68页。

⑤ 《致唐继尧电（1918年3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93页。

个过程中，李烈钧都是以滇、黔、川“全权代表”而不是作为军政府成员的“身份”活动的。

首先，加紧同陆荣廷桂系的“联络”。

还在1917年8月23日，李烈钧与岑春煊联名致唐继尧电中就提出：“西南枢纽，在公与干老（陆荣廷字干卿——著者注）。今国事方艰，彼此联络，方足以固局势而奠邦基。”<sup>①</sup>李烈钧并于11月间亲赴梧州，同陆荣廷会晤。

当时，孙中山也先后派张继、胡汉民等往访陆荣廷。但孙中山的目的在于争取陆荣廷对护法的支持。尽管陆一开始就表示不承认军政府，孙中山从维护护法大局出发仍不放过一切机会和可能，乃至迁就。李烈钧则主要着眼于滇、桂的“融合”。与陆荣廷晤谈后，李烈钧在致唐继尧电中就不加掩饰地说：“钧到梧详察一切，现在大势，将来国事，非滇、桂融合一气，公与干老切实提携擘划，殊难造国家于完满之域，亦惟公与干老有此魄力，能造国于完满之域也。”<sup>②</sup>李烈钧同时致电陆荣廷表示：“本午抵粤，一切谨遵囑办理。”<sup>③</sup>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继、胡汉民等则毫无结果。

其次，与唐继尧图川遥相呼应。

护法战争打响后，唐继尧更加全力于对四川的扩张。李烈钧接连致电唐继尧、刘显世，对唐攻占四川表示支持，称：“滇黔义师，若乘此机，攻取重庆，确实占领川东，以观中原形势，求相当的发展，图永远之安全，斯为前途幸也。”“滇黔义军，将从根本上解决时局，此系最上之策，亦最好机会。”他还明确表示：“弟当在此设法，遥为策应一切。”<sup>④</sup>

当然，如上所说，孙中山为打开护法局面也在极力争取唐继尧，承认唐向四川的发展，甚至要西南各地方实力派接受唐的统一指挥。但主要是换取唐就大元帅职，以示对军政府的支持。而对唐就大元帅职，李烈钧则从未提及。相反，复电唐与刘显世，出谋划策说：“在昔一般人士，对于滇、黔主张，不甚注意，兹则驾乎他省之上矣。”因此，“现以西南而论，力谋团结，以赴事机，刻不容缓。以滇、黔而论，关于一切主张，似应从积极以立说，以促进他方面之战事，融洽他方面之人心，而令共当冲要。

① 《与岑春煊复唐继尧电（1917年8月23日）》，《李烈钧文集》，第328-329页。

② 《致唐继尧电（1917年11月22日）》，《李烈钧文集》，第335页。

③ 《致陆荣廷电（1917年11月23日）》，《李烈钧文集》，第336页。

④ 《复刘显世电（1917年11月17日）》、《复唐继尧电（1917年11月29日）》，《李烈钧文集》，第334、340页。

至关内部，或调和川中感情，或扫荡川中叛军，联络荆襄，巩固滇、黔、川局势，再看大局变迁如何，相机因应。”<sup>①</sup>当四川督军发生纠纷时，李烈钧一面建议由唐继尧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一面要熊克武拥戴唐继尧，“推诚相与，协力偕行，毫无隔阂”<sup>②</sup>。之所以要唐继尧发表任命而不主张活动各方面推举，李烈钧强调说：“冀公为当代英豪，吾必竭力赞助，以能得全国信仰为主。川局如何处置，影响于他省者甚钜，现国人对于冀公固咸注目视之，能由冀公发表，推锦帆为督军，则纠纷尽释，人望愈归矣。”<sup>③</sup>所谓“融洽他方面之人心”、“能得全国信仰”、“人望愈归”等等，无非是造成唐继尧在政治上的“中心”地位。

再次，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卖力的，是发起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并由此导致军政府改组。

关于发起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议”，笔者曾撰文详加考察<sup>④</sup>。这里只着重指出：①发起组织时断时续，曲曲折折，贯穿于第一次护法整个过程中。②李烈钧既是真正发起人，又是重要推动者，始终扮演主要角色。③孙中山虽最初赞成成立“西南各省联合会”（“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前身），但其时主要是军事联络性质，其后则完全与该宗旨相背离。④越来越明显表现出排斥、对抗军政府的倾向。如李烈钧在致唐继尧密电中，谈及“联合会议”所以推举唐与陆荣廷、程璧光为军事总代表，就借用岑春煊的话说“只好由联合会议推为军事总代表，将军政府无形取消”。⑤最后，在所谓“合并军政府与联合会议为一机关”喧嚣中，使军政府改组演为事实。

正由于此，当孙中山遭排斥、军政府改组后，唐继尧立即通电就总裁职，并委李烈钧为代表。李烈钧亦接连发电，鼓吹军政府自唐通电就职，岑春煊被推为主席总裁，“众议渐息，融和较前为易”<sup>⑥</sup>；“军府自改组以来，义声益壮，迭次会议进行，意见一致”<sup>⑦</sup>；“粤中局势，比前较佳”<sup>⑧</sup>。李烈钧并通电宣布就任参谋部长，还特意称“奉唐总裁委托，政务会议特任掌管参谋，依法代行职权；复奉政务会议特任”<sup>⑨</sup>。其一疏一亲，立场是

① 《复唐继尧、刘显世电（1918年1月4日）》，《李烈钧文集》，第359~340页。

② 《致熊克武电（1918年6月21日）》，《李烈钧文集》，第479页。

③ 同注②。

④ 《李烈钧与“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北京，《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

⑤ 《致唐继尧电（1918年8月8日）》，《李烈钧文集》，第493页。

⑥ 《致章太炎电（1918年8月31日）》，《李烈钧文集》，第498页。

⑦ 《致唐继尧电（1918年8月15日）》，《李烈钧文集》，第494页。

⑧ 《就任参谋部长通电（1918年8月19日）》，《李烈钧文集》，第495页。



何等分明！

李烈钧当时对孙中山和军政府的态度，在驻粤滇军方面也有明显反映。

其一，不赞成孙中山驱逐莫荣新。当时，广东代督军莫荣新秉承陆荣廷旨意，不仅不承认军政府，而且百般阻挠破坏。为保证护法进行，孙中山在忍无可忍情况下决定除去这一阻力。驻粤滇军则表示反对。孙中山曾透露说：“我自护法南来，未能实现护法主张，去了一个陈炳焜，又来一个莫荣新，都是护法障碍。这几日，因为我决心要驱逐莫荣新的秘密消息，被李烈钧、吴景濂、王正廷他们晓得了，所以他们时来劝解，阻我不要动作。”驻粤滇军师长方声涛亦“严词谏阻”，为孙中山断然拒绝。孙厉声斥责说：“吾意已决，毋劳借箸。吾为民除害，今即以身殉民，份也。汝师不我助，或反助敌，唯君自择，吾无介焉。”炮击督军署发动后，孙中山命人运动滇军陆上响应，旅长朱培德极力反对，致滇军两团“动作不能一致”<sup>①</sup>。可见，孙中山逐莫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与李烈钧及驻粤滇军不支持有很大关系。

尽管如此，孙中山对驻粤滇军的处境还是表示体谅，当着驻粤滇军官佐的面坦言：“滇军在粤，餉械皆仰给于广东，不得不审慎再三，故难遂初志。”<sup>②</sup>另一方面，仍抱有“莫大之希望”，希望能得到驻粤滇军的切实支持，特别是对军政府的承认。他苦口婆心劝诫说：“在座诸长官，未必无殉国之思，然尚未见有何表示。即现在之军政府，西南护法各军，不特不见拥（戴），并未见承认……故今日兄弟为国家、为约法，求滇军各将士承认军政府。若大家不承认军政府，将来无论如何胜利，仍不失为叛徒、为土匪。滇军诸将士千里转战来粤，都是热心爱国，都是最有智识。若以兄弟为不能负此责任，亦宜另组织一政府。不然，难免不蒙不好之名。若能合为一气，一致进行，排除障碍，统一中国，将来定可为世界第一等强国。”<sup>③</sup>言词不谓不严厉，态度不谓不诚恳。然而，除护法以来一直支持孙中山的张开儒慨然宣布就任军政府陆军总长外，驻粤滇军并未有何种拥戴行动。对孙中山的严厉批评，李烈钧虽未当面否认，却言不由衷地归

<sup>①</sup> 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088-1091页。

<sup>②</sup> 《在宴请海军、滇军官佐会上的讲话（1918年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04页。

<sup>③</sup> 《在宴请滇军第四师官佐会上的讲话（1918年1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97-300页。

咎于“力有未逮”，实际没有接受。他说：“兄弟之崇拜大元帅非至一日，受大元帅之委任，亦非止一次。今日军政府之所以不能发展者，一由忌先生之才能者故意阻挠，一由素所崇拜先生者未得尽心，即欲尽心而又有有力不逮者。兄弟亦欲尽心辅助我大元帅，而力有未逮之一人。”<sup>①</sup> 相比之下，方声涛倒也说得直快，他说：“兄弟对于大元帅，素所崇拜，素所信仰。然自大元帅到粤组织军政府以来，而未能竭力襄助我大元帅，使非颠狂，何以若此？然其中实有不能出口之苦衷，所以不能尽我心思，为大元帅帮忙。”<sup>②</sup> 所说的“不能出口之苦衷”，就是不能不为唐继尧的态度所左右。

其二，军事行动并非完全受孙中山节制。

考李烈钧活动，参与军事谋划与战事占有相当比重。这不仅见之于李烈钧当时大量的函电，有关孙中山的文献记载中也多有所反映。例如：护法开始后，1917年9月6日，李烈钧谒见孙中山，“商承军事进行大计，勾留是间七八句钟之久”<sup>③</sup>。10月9日，孙中山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派员与陆荣廷及两粤督军等磋商抵御龙济光计划，以滇军第三师援湘，以滇军第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等<sup>④</sup>。讨伐龙济光取胜后，李烈钧致电孙中山称：“会师讨龙，防务完竣，即班师回省，策应大局。”孙中山复电，嘉奖说：“屠龙防务已竣，执事一出而大功即成，为粤除巨害，裨益大局已多，曷胜欣慰。现北敌由赣来侵，尤非执事力任防务总指挥，不足以资应敌。”<sup>⑤</sup> 但同时，李烈钧又多次出席莫荣新召开的军事会议，参与军事谋划。如11月24日参加莫荣新在督署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中决定以陆海军联合攻闽，海军以程璧光为总司令，陆军分别以林虎、陈炯明、李烈钧为桂、粤、滇军总司令<sup>⑥</sup>。关于军事往来函电远较孙中山为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烈钧当时公开称其军事行动系依照陆荣廷、谭浩明、莫荣新等的既定方针或商定计划进行的。如11月22日李烈钧同陆荣廷“会晤”后致唐继尧电称：“本日返粤，依干老计划，进攻闽、浙。”<sup>⑦</sup> 12月1日致谭浩明电：“滇军两师，蒙干老补充子弹，准备已妥，协同桂、粤军各一旅并海军，

① 《军政府宴请滇军席上之演说》，上海，1918年2月2日《民国日报》。

② 《军政府宴请滇军席上之演说》，1918年2月3日《民国日报》。

③ 1917年9月15日《民国日报》。

④ 《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069页。

⑤ 《李烈钧致孙中山电（1918年4月19日）》、《孙中山复李烈钧电（1918年4月22日）》，《李烈钧文集》，第423页。

⑥ 《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083页。

⑦ 《致唐继尧电（1917年11月22日）》，《李烈钧文集》，第335页。

数日内可以出发攻闽，并同时援助浙江。”<sup>①</sup>又如1918年3月7日致陆荣廷等电称：“遵干老计划、承月公（谭浩明）委托，移师屠龙，本日出发，赴新会。”<sup>②</sup>再如致方声涛电称：“西南作战，滇黔川与湘粤桂，本两大区。……对湘作战，应取决于干老；对赣对闽作战，应取决于日公（莫荣新）。”<sup>③</sup>这就清楚表明，李烈钧的军事活动虽然与孙中山有关联，在总体上也可以说与护法运动的要求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却主要不是受孙中山的领导。换言之，如果李烈钧率领驻粤滇军完全像张开儒那样，自觉站在军政府一边，听从孙中山的调遣，虽然最终不可能改变护法失败的命运，但至少对桂系是一个不小的制约，局面会好一些。当然，这只是假设，历史毕竟以其固有轨迹而变化，而发展。

其三，遵从唐继尧意愿，心甘情愿交出驻粤滇军指挥权。

1918年2月13日，李烈钧致函李根源、方声涛，提出驻粤滇军合推李为滇军总司令、方为征闽靖国军总指挥。其函称：“窃以治军必先论将，是在得人专责，乃有成功，矧关作战。当国步维艰之日，正贤豪效力之秋。敬维印公，胸罗兵甲，腹裕铃韬，伟绩前昭于军院，道范近莅乎珠江，合推为滇军总司令。复维韵公，雄才卓犖，谋略渊深，既履险而如夷，信所攻之必克，合推为征闽靖国军总指挥。”<sup>④</sup>其时，李根源经陆荣廷、莫荣新“迭电邀约”，已于1月抵达广州<sup>⑤</sup>。3月12日，李烈钧专电唐继尧报告说：“印泉到粤，抱二宗旨：一促成统一机关；一振刷滇军而维系之。前者内部业已商妥，因有特因，稍待时日，即可实行。后者效力颇大，讲武学生曾开会欢迎印泉，钧提议印泉为滇军总司令，藻林首先赞成，各将校一致欢跃。韵松已将驻省之朱旅杨团先行交出。藻林骇大，实际上虽或不易指挥，尚可再用工夫。拟请我公即电委印泉为留粤靖国军总司令……至将来调渝调湘，俟印泉接管后，皆易办也。”<sup>⑥</sup>从两电中可以看出：1. 驻粤滇军交由李根源指挥，表面上由李烈钧自己提出，但明显为桂系所要求、唐继尧所授意，所以李电唐继尧称李根源到粤所抱宗旨之一是

① 《致谭浩明电（1917年12月1日）》，《李烈钧文集》，第341页。

② 《致陆荣廷等电（1918年3月7日）》，《李烈钧文集》，第394页。

③ 《致方声涛电（1918年7月11日）》，《李烈钧文集》，第485页。

④ 《致李根源、方声涛函（1918年2月13日）》，《李烈钧文集》第385页。

⑤ 孙天霖：《护法期间驻粤滇军内部矛盾见闻录》，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编者印行，1962，第114页。

⑥ 《复唐继尧电（1918年3月12日）》，《李烈钧文集》，第395页。

“振刷滇军而维系之”。至于电中所称“以忧劳，渐成衰废”，固为借口，因为他随后不久即“应各方请求”，出任讨龙军前敌总指挥。2. 对于交出驻粤滇军指挥权，同遵唐继尧所有旨意一样，李烈钧毫无勉强，并召开会议力促其成。驻粤滇军交与李根源后，李烈钧在军队部防、作战及请领饷械方面仍不时发号施令，筹划交涉，俨然以唐继尧“代表”凌驾其上，也说明了这一点。3. 电中特别提到张开儒“鹭大”、“实际上虽或不易指挥，尚可再用工夫”等等，则多少透露了此次驻粤滇军改组排张的真正意图。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上述李烈钧提出推李根源为滇军总司令时，张开儒因公开支持孙中山和军政府已越来越为桂系和政学系所不容，攻击张“在在与粤挑衅”，“举动如此，势且激成大变”，请唐继尧对张“迅为处置妥协”<sup>①</sup>。后来则变本加厉，必欲除之而后快。莫荣新密电唐继尧煽动说：张“自任军政府陆军总长以来，举动莫测，不惟反对协和，侮蔑荣新，即我公命令，亦视若弁髦。”<sup>②</sup>唐继尧本来就对张开儒通电拥护护法不满，指责其“言太激烈，有损无益”，“勿再乱说”<sup>③</sup>，自然对桂系的攻击采取怂恿的态度。莫荣新等遂有恃无恐，进而捏造罪名强行夺取张开儒的兵权，将张的秘书长崔文藻枪杀；一面支持李根源“统一了滇军第三四两师，取得指挥管辖之军事权”。唐继尧不仅称赞莫荣新“处理甚为适当”，同时复电李根源，要求把张开儒押送回滇“依法处办”。<sup>④</sup>在此过程中，虽然未发现李烈钧同莫荣新、唐继尧有何“密谋”，却也无任何反对表示，显然是赞同的，或者说是默许的。

所有这些，清楚表明李烈钧在第一次护法中实际扮演着不支持乃至反对孙中山及军政府的角色。固然在某些方面，比如呼吁“团结”、坚持武力护法、反对同北洋政府“调和”等，单从言词看似也同孙中山“一致”，甚至被舆论誉为“义勇闻于全国、无义不与之”<sup>⑤</sup>。但实际上，在如何实现“团结”、坚持护法根本问题上，则完全唯唐继尧马首是瞻，无视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甚至视为障碍，因而不拥戴，不支持，乃至“打消”。

① 《杨晋致唐继尧密电（1918年3月19日）》、《杨晋致唐继尧密电（1918年3月2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伪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

② 《莫荣新致唐继尧密电（1918年5月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伪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

③ 《唐继尧指责张开儒通电太激烈，并责令用人尤宜慎择复张开儒密电（1917年8月2日）》，转引自谢本书《唐继尧评传》，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第89页。

④ 《唐继尧复李根源密电（1918年6月14日）》，转引自谢本书《唐继尧评传》，第96页。

⑤ 《军政府成立详见》，1917年9月21日《民国日报》。

其实，对于这一点，李烈钧当时并不隐讳。在致滇黔川各主帅电中，他一再表白说：“受委以来，在粤周旋，虽未为公等增恶感，然因此不免敷衍过分。”护法以来，“对各方面恒本滇黔川意旨，无偏重亦无压抑。”<sup>①</sup>军政府改组后，更明确说：“烈钧承唐总裁委托，执役军府，当以滇黔川之意思为意思。且滇黔川之意思，即为唐总裁之意思。”<sup>②</sup>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为滇黔川“代言人”的立场及对唐继尧的忠诚。

李烈钧晚年所写“自传”，述及第一次护法，通篇不提他与唐继尧的这种特殊关系，而把自己描绘为始终拥戴孙中山，显然文过饰非，与事实不符<sup>③</sup>。

### 三

但历史发展是曲折复杂的。当孙中山开始第二次护法时，李烈钧由于同桂系的斗争与唐继尧、孙中山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化。

军政府改组后，李烈钧不久即遭到桂系及政学系的排挤，实际处于“闲散”地位，以至萌发了“称疾引退”的思想<sup>④</sup>。同时，李根源取得驻粤滇军指挥权后与桂系和政学系关系密切，同唐继尧的矛盾日趋尖锐。1920年2月初，唐继尧遂以李根源为建设会议代表，借机将驻粤滇军改归直辖，委托李烈钧就近指挥。李烈钧接唐电，即于2月13日宣布就总司令职，并称奉唐“以扶助滇军之责相属”，“不得不勉任匡扶”<sup>⑤</sup>。但李根源并不愿交出指挥权，千方百计谋求对抗。“是时，军政府为李根源撑腰，莫荣新亦以陆军部长地位，暗中派桂军部队对所在滇军进行监视，并准备必要时出面干涉。”<sup>⑥</sup>于是，一场围绕驻粤滇军指挥权的争夺战爆发了。

李烈钧对夺回驻粤滇军是坚决的。为挫败莫荣新、李根源企图改编驻粤滇军的阴谋，李烈钧决心冲出桂系的包围，亲自到滇军驻地进行“劝

① 《致滇黔川各主帅电（1918年3月6日）》、《致滇黔川各主帅电（1918年4月10日）》，《李烈钧文集》，第393、413页。

② 《在军政府招待两院议员会上的演说（1918年9月29日）》，《李烈钧文集》，第504页。

③ 《李烈钧自传——护法及讨龙援赣诸役》，《李烈钧文集》，第822~826页。

④ 《谭人凤致李烈钧电（1918年11月20日）》、《孙中山致李烈钧函（1919年3月13日）》，《李烈钧文集》，第506、508~509页。

⑤ 《致参众两院函（1920年2月13日）》，《李烈钧文集》，第515~516页。

⑥ 孙天霖：《护法期间驻粤滇军内部矛盾见闻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26页。

慰”。2月24日，李烈钧托词“巡视北江防务”，秘密离开广州，宣称：抱病出巡，“实在道义、人格上有不得不然者”<sup>①</sup>。但李烈钧刚走，莫荣新即派军队50余营水陆并进，沿途堵截，并到处张贴悬赏缉拿李和朱培德的告示。李烈钧一面斥责莫荣新、李根源“处置太狠毒”；一面组织反击，历经险阻，于3月17日抵达驻粤滇军的集中地始兴。

孙中山自回到上海后，一直关注李烈钧的处境和去向。李烈钧与孙中山之间的信函往来这时也日渐增多起来。当争夺驻粤滇军的消息传到上海，孙中山为李烈钧能再领驻粤滇军深感庆幸，致函祝贺说：“足下以戡乱长才，久困群小，抚髀之叹，能勿同情。今竟合浦珠还，用武有地，岂惟一人之庆，实亦邦国之光。”勉励其“群策群力，以达吾党最终之目的。”<sup>②</sup>同时，致电刘显世、唐继尧、王文华等，望迅速出兵援助李烈钧，强调指出：“西南成败在此一举，若舍此不图，贻误滋大。”<sup>③</sup>在致唐继尧电中，还特别说：“协和此次以维持兄之威信，故问道出始兴。……桂贼今用数倍之众，围而攻之，非速救恐仍不勉。……夫协和冒九死一生而蹈绝地，实为兄也。”<sup>④</sup>孙中山之所以重视这场斗争，并发起援救李烈钧运动，正如其在致李烈钧电中所说：“以足下能讨桂贼，以伸国法，援足下亦所以护法也。”<sup>⑤</sup>即同护法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关系护法发展的重要一环。

当然，由于得不到唐继尧等的实际支援，在莫荣新等做出不改编驻粤滇军的让步条件下，李烈钧最终接受岑春煊的“调停”，回到了广州。孙中山虽然对李烈钧的“谋和”不满，指责其“如此不武，殊出意外”，但在要陈炯明加紧图粤的同时，对李仍寄予希望。如将讨桂计划电告李烈钧，并要他“设法速离粤来沪，转入湖南，统帅一部赴韶，与滇军联合”，约定与陈炯明“同时进攻”<sup>⑥</sup>。而通过争夺驻粤滇军，特别是孙中山的关

① 《复伍廷芳函（1920年3月11日）》、《复林虎函（1920年3月11日）》，《李烈钧文集》，第518～519页。

② 《贺李烈钧重握兵符函（1920年）》，《国父全集》第5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第195页。

③ 《致王文华电（1920年3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232页。

④ 《致唐继尧促速出兵百色攻陆莫老巢电（1920年）》，《国父全集》第5册，第195～196页。

⑤ 《致李烈钧函（1920年2月下旬）》，《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19页。

⑥ 《致孙科指示汇款用途及军机并附致李烈钧电（1920年4月15日）》，《国父全集》第5册，第210页。

注、联络，李烈钧事实上也缩短了与孙中山的距离。此后不久，李烈钧设法逃离广州，经香港转赴上海。6月2日，作为唐继尧代表出席孙中山举行的会议，会议决定由孙中山、唐绍仪、唐继尧、伍廷芳四总裁发表宣言，否认军政府及在广州的国会。会后，李烈钧发表谈话宣称：“予参与此次宣言之主旨，第一在表示反对广东之所谓军府，正式与岑西林脱离关系。”<sup>①</sup>

以上表明，当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拉开帷幕时，李烈钧虽然同第一次一样，名义上仍为唐继尧的“代表”并握有驻粤滇军指挥权，但几经磨难在思想和行动上同孙中山的关系已有了很大的改善。

是年8月，孙中山命陈炯明誓师回粤讨伐桂系，10月克复广州。11月，孙中山自上海抵广州重组军政府。但孙中山此次并不以此为目的，而坚持组织正式政府。1921年4月7日，国会议员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就大总统职，宣布正式政府成立。李烈钧被孙中山任命为参谋总长。

但另一方面，自驻粤滇军问题发生后，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等虽然不满桂系的专横而与孙中山“形式上联成一气”，唐继尧却并非真心实意。这样，随着护法斗争的全面展开，李烈钧与唐继尧关系出现裂痕以至破裂，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首先，对孙中山主张组织正式政府，唐继尧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尽管唐是年2月被部下顾品珍赶出云南，孙中山出于团结的愿望，在重组军政府时仍派人到香港接其到广州，还亲到车站欢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唐继尧这时也表示愿留在广州执行总裁职务，说：“如有重要事件，可以随时面商。”但当孙中山提出建立正式政府，唐继尧便很快杀机毕露，恶狠狠攻击孙中山实行“独裁制，阴授意派议员，组织总统选举会，欲自为总统”<sup>②</sup>；一方面暗中支持陈炯明等反对孙中山。随后，通电解除政务总裁及参谋总长之职，离广州返回香港，表示不与孙中山合作。

与此相反，当时远在贵州镇远的李烈钧对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持热烈欢迎的态度，致电祝贺说：“我大总统手创共和，功垂民国，扶持正义，始终不渝，树立宏猷，诸臻完善，凡在国民，罔不爱戴。此间军民称庆，

<sup>①</sup> 《在上海与〈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1920年6月6日）》，《李烈钧文集》，第528页。

<sup>②</sup> 转引自《唐继尧评传》，第132页。

士庶欢腾。烈钧奉令，驻守黔边，谨当整饬各部，用效驰驱。从此排除障碍，傅导祥和，维我大总统实利赖之。敬申弛贺，无任悚惶。”<sup>①</sup>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孙中山的真诚和拥戴之情。如果同第一次护法时同孙中山若即若离的情景相比较，该电不啻标志着李烈钧完全转向和自觉服从孙中山。从实际效果看，如时人所评论：当孙中山决定组织正式政府时，“西南盛唱联省自治之说，颇不以总理此举为然，独先生由镇远行营，通电拥戴，而人心大定，一致倾向。”<sup>②</sup>可见李烈钧的拥戴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如果说，拥戴、反对孙中山为大总统表现了李烈钧同唐继尧政治态度的分野，那么紧接下来发生的煽动与反对驻桂滇军回滇，则是一场公开较量。

孙中山发动的第二次护法，其主要目标是实行北伐。为此，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不久，即于10月亲赴广西进行部署。但就在这时，时刻想打回云南卷土重来的唐继尧认为有机可乘，阴谋煽动驻桂滇军脱离北伐帮他实现回滇的计划。唐继尧一面对其亲信煽风点火，攻击“孙之地位岌岌动摇，不早自谋，终必无幸”；孙之北伐“在谋地盘”，“纯为私图”，是“借北伐为名，急谋攫取湘赣地盘，以为安身之地，所谓讨北，当门面话也”<sup>③</sup>。一面加紧与陈炯明相勾结，陈答应“如贵军移动有阻，决以全力援助，并确实担任饷项”<sup>④</sup>。随后，唐继尧亲赴柳州，采用封官许愿、金钱收买、欺骗等手段一步步将其策动驻桂滇军回滇计划付诸实现。

对于唐继尧煽动驻桂滇军脱离北伐行径，孙中山先是致电或派人要唐“赞成北伐，勿阻挠大计”<sup>⑤</sup>，还表示：如唐允随军北伐，当委以大本营参谋长重任<sup>⑥</sup>。而当唐继尧无视劝阻悍然驱动部分驻桂滇军开往云南时，孙中山毅然下“制止令”，斥责唐“违抗命令”，命桂、滇、黔各省当局迅即严行制止，“毋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sup>⑦</sup>。

身为驻桂滇军的统帅，李烈钧尤感责任重大，因而处理更为果断。还

① 《致孙中山电（1921年4月13日）》，《李烈钧文集》，第544～545页。

② 杨庚笙：《宁武李公协和先生事略》，见《李烈钧文集》，第872页。

③ 《唐继尧致张伯群等电》、《唐继尧致胡李司令官等电》，转引自《唐继尧评传》，第133页。

④ 《唐继尧致张伯群等电》，转引自《唐继尧评传》，第133页。

⑤ 《上海快信摘要》，长沙，1921年11月18、19日《大公报》。

⑥ 《上海快信摘要》，1921年11月16日《大公报》。

⑦ 《致马君武等电（1922年2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88页。



在唐继尧企图利用金钱收买驻桂滇军将领时，李烈钧时驻贵州的长安，得悉后迅即赶往桂林，将鼓噪回滇最力的唐继尧亲信杨益谦第二路总指挥职务撤去，委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被称赞为“采断然处置者”<sup>①</sup>。唐继尧则“大愤，谓李无撤换官长之权，密令杨不交代，暗争甚烈”<sup>②</sup>。李烈钧根本不予理睬，迳将上情呈报孙中山。孙当即复电，称赞说：“杨部擅自开动，别事企图，内启友军之疑，外授敌人以隙，实属不顾大局。执事曲突徙薪，措置如法，获免燎原，具征智珠在握，毋任钦佩！益之（朱培德）大节凛然，有谋有勇，不愧干城之选，领袖滇军，定能胜任愉快。”<sup>③</sup>肯定李烈钧处决果断，在危急时刻避免了驻桂滇军整个被唐继尧拉去的危险。当时也有评论说：唐继尧“其具有回滇之野心，早为人所料及。惟其计划，首被李烈钧、朱培德以釜底抽薪手段，驱黜杨益谦，于是桂林滇军悉惟李、朱马首是瞻。此唐继尧回滇阴谋之第一失败也。”<sup>④</sup>

但唐继尧不会也不可能就此罢休。李烈钧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所以既不认为唐会停止回滇活动，也不大相信唐到桂林参加北伐的谎言，始终保持警惕。其对付办法，一是“晓以大义”，说服争取相当部分驻桂滇军继续留在北伐行列。原为唐继尧极力拉拢的谷正伦所率黔军，在李的争取下，最后也宣布“决不附和”，使唐“大失望”。二是连电唐继尧，催其速赴桂林。三是采“联顾制唐”方针，致电或派人要顾品珍真正拥护孙中山，与广州政权结为一气。四是密使人监视唐继尧，注意唐及其亲信的动向，“随时密陈”。当时有评论说：“孙唐李暗潮甚急。唐继尧主张先定滇后北伐，孙中山则以顾品珍已服从称大总统，无去顾之理由。李协和则附孙排唐，如唐必回滇，则请孙联顾，前后夹攻其众，缴械解散，不能使唐得逞。”<sup>⑤</sup>尽管后来唐继尧还是煽动部分驻桂滇军打回云南，但整个过程表现了李烈钧毫不动摇维护北伐、反对唐继尧分离驻桂滇军的坚定立场。

经此事件，现实使李烈钧更加紧密团结在孙中山周围，成为孙依赖的重要助手之一。正像孙中山在一祝贺李烈钧等指挥攻赣电中所热烈表示的：“攻赣数日，迭克名城，盖仁者之师，所向无敌。然实由诸将士忠于主义，勇于牺牲，而亦由于各军长官本革命之精神，有以成其运用之妙。”

① 吴宗慈：《护法计程》，《革命文献》第51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0，第564页。

② 《上海快信摘要》，1921年11月10日《大公报》。

③ 《复李烈钧电（1921年1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25页。

④ 《唐继尧回滇计划失败》，1922年1月10日《大公报》。

⑤ 《上海快信摘要》，1921年11月16日《大公报》。

又称“改造国家之责任，惟文与诸君能负荷之，亦惟文与诸君能相与有成”，“愿我师徒交相劝勉”。<sup>①</sup>包含着多么深厚的情谊和信任，读来又是何等令人感动！

这一点，在随后发生的陈炯明叛变事件中表现得亦为明显。陈叛变时，李烈钧正在北伐前线，尽管有病缠身，接孙中山手书后仍决定与许崇智“星夜率领滇、粤两军回粤平乱”<sup>②</sup>，表示：“陈氏抗叛，实足痛心”，自当“率师返粤，灭此朝食”<sup>③</sup>。同时将战况及时报告孙中山。期间，孙中山还致电李烈钧，令其指挥前方各军，“以收统一之效”。李烈钧后来回忆这段历史说：陈炯明叛变发生，“全军士气，胥受影响。余忧愤成疾且剧，乃亟令各军撤回，作援助总理之备。而陈已派重兵分驻粤北，余亟由大庾趋南雄防堵”。卒以众寡悬殊，相继失利。回到上海后，“此时余病未愈，总理常亲临视。痊愈乃时晋谒”。<sup>④</sup>这个回忆大体是符合实际的。班师回粤失败为当时总的情势所决定，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挽回；而且，患难见真情，由此李烈钧与孙中山的关系愈加密切。事实上，李烈钧病愈不久，即与胡汉民等被孙中山委以“全权代行大总统职权”，赴粤策划讨陈；接着又亲赴潮梅地区，收编陈炯明所部归附孙中山。1923年2月孙中山抵广州，李烈钧被委任闽赣边防督办，后改任大本营参谋长，随孙中山指挥各军对陈炯明部发动反攻。

值得注意的是，唐继尧回到云南重掌权柄后，出于个人目的，仍设法与孙中山保持联系。比如：1923年初派代表王九龄携其函赴上海晋谒孙中山，函中一方面虚假表示自回滇后“未得长奉明教”，“笈候久稽”，“然钦崇左右之心，固未尝以睽违乖隔而稍异”；一方面称颂孙中山“主持兵工政策为天下先，今海内言裁兵者，皆奉为至当不易之圭臬”<sup>⑤</sup>。又如：1924年6月再派王九龄持函赴粤见孙中山，表示“竭诚拥护”孙中山，合作讨直<sup>⑥</sup>。为争取唐继尧参加北伐，1924年9月1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大本营军政联席会议，推举唐为大本营副元帅，又请其出任川、滇、黔联军总司令职，就近主持三军出师北伐大计。然而，如同第一次护法时的情景，唐继

① 《致李烈钧等电（1922年6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42页。

② 《与许崇智致孙中山电（1922年6月17日）》，《李烈钧文集》，第559页。

③ 《复上海某电（1922年6月）》，《李烈钧文集》，第559页。

④ 《李烈钧自传》，见《李烈钧文集》，第835页。

⑤ 《滇唐钦崇中山先生之表示》，1923年2月20日《民国日报》。

⑥ 《羊城要事短报》，1924年6月19日《民国日报》。

尧只愿任川、滇、黔联军总司令，而对副元帅拒不就职。应该说在此前后，李烈钧同唐继尧有较多发生接触的可能和机会，但事实上绝无任何联系，说明经过反对煽动驻桂滇军回滇斗争，李烈钧实际上已同唐继尧分道扬镳，彻底决裂。当然，唐继尧由此忌恨李烈钧，也是一个方面。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李烈钧同唐继尧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密切到决裂的变化过程。如果单从密切言，讨袁护国战争中形成的统率驻粤滇军无疑是贯穿期间的重要因素，它在相当一段时间和程度上制约、影响着李烈钧同唐继尧关系的发展，同时实际决定和影响了李烈钧在护法开始时所担当的角色及所起作用。但终究不是问题的全部，根本还是个人的因素，即通过实践对孙中山感情的增强和对唐继尧的逐渐认识。这就是同样为驻粤滇军的统帅，而在唐继尧策动滇军回滇时有截然不同表现的原因。说明李烈钧固然同唐继尧曾有过极为特殊的关系，而且由此在第一次护法中留下了连其本人都不愿正视的一页，但毕竟与唐不同，最终还是回到了孙中山身边，为孙中山所倚重。

诚然，李烈钧同唐继尧关系的破裂发生于唐被赶出云南之后，从客观说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李烈钧在实际斗争中自觉“回归”于孙中山领导。他同唐继尧破裂前后的表现，都清楚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人物的聚散离合是经常发生的。历史揭示其关系变化，目的在于加深问题研究的层面，从而对他们做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但有人在论及李烈钧同唐继尧的关系时，认为李烈钧是“军阀兼政客，野心不在唐下”，甚而说“唐继尧对孙中山先生向来是很崇敬的，其所以由合作而最后走向分裂，关键就在于李烈钧从中阻挠、破坏”<sup>①</sup>。这种看法显然有悖历史真实，是不足取的。

（发表在台北《近代中国》158、159期，2004年12月，原文19000字）

<sup>①</sup> 詹秉忠：《唐继尧回滇复辟活动二三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85页。